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中華書局
北京 201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10輯/張伯偉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14.10

ISBN 978-7-101-10413-4

I. 域… II. 張… III. 漢學-研究-國外-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10894 號

-
- | | |
|------|---|
| 書名 |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輯 |
| 編者 | 張伯偉 |
| 責任編輯 | 孫文穎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3 插頁 2 字數 502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10413-4 |
| 定價 | 98.00 元 |
-

目次

日本漢籍研究

日本年號資料在漢籍校勘上的價值與限制

——以經書校勘為考察中心 水上雅晴(3)

經學文獻在古代日語文化中的展開

——以源為憲撰《世俗諺文》為中心 河野貴美子(17)

空海《文筆肝心鈔》之編纂意圖及佚文考 陳 翀(39)

北宋對外交往機制的另一面

——以《參天台五臺山記》的記載為線索 朱 溢(57)

高島吞象《高島易斷》與明治政治 吳偉明(75)

從“妄論國事”到“好意苦言”：《觀光紀游》

在近現代中國的接受、評價及影響 葉楊曦(91)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大同江》作為海東名詩典範的確立與接受 蘇 岑(113)

朝鮮朝燕行文獻與清代前期語言的使用

——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 汪銀峰(139)

李宜哲《朱子語類考文解義》研究 鄭堪謨(147)

十九世紀燕行錄解題 孫成旭(177)

《清芬室書目》與李仁榮的版本學 朴肯鈺(205)

越南漢籍研究

越南北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 葉國良(227)

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國觀感與應對

- 兼和朝鮮燕行文獻比較 陸小燕(241)
- 越南正和本《大越史記全書》編撰體例略論 葉少飛(261)
- 阮輝傑《奉使燕臺總歌》考校 劉玉琚(277)
- 越南潘佩珠所著《萬里逋逃記》研究 李奎(293)

漢籍交流研究

漢簡《論語》校讀札記

- 以定州簡與朝鮮平壤簡《論語》為中心 魏宜輝(311)
- 日本所藏王羲之法帖總說
- 兼及日本新發現《大報帖》初探 成田健太郎(321)
- 新公佈之日藏古鈔本《毛詩正義·秦風·小戎》、
《蒹葭》殘卷三種校錄及研究 石立善(333)
- 鴻臚館裏文章盛 遠人自來證中華
- 試論鴻臚館中的“華夷思想”與
“文章經國” 廖榮發(357)
- 和刻三卷本《韓內翰香奩集》之版本研究 陳文佳(375)
- 和刻本《又玄集》跋 趙庶洋(391)
- 日本藏《鐔津文集》版本及其文獻價值 定源(王招國)(399)
- 《熊龍峰四種小說》再考 黃冬柏(417)
- “東坡體”：明代中韓詩賦外交之戲筆與競技 衣若芬(433)
- 《林居漫錄》東傳朝鮮及其風波 杜慧月(461)
- 文士、浪人、說唱傳統及近代中日間的文化互動：
以宮崎滔天為個案 阮斐娜 著 劉超 譯(471)

研究綜述

- 中日學者關於井真成墓誌的研究 馬雲超(493)
- 日藏禪宗墨跡研究綜述 國威(515)

- 稿約 (523)

日本漢籍研究

日本漢籍研究，是研究日本漢籍的學術性刊物。本刊旨在探討日本漢籍的源流、內容、價值及影響，並介紹日本漢籍的研究現況與發展趨勢。本刊歡迎國內外學者投稿，以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

日本年號資料在漢籍校勘上的價值與限制

——以經書校勘為考察中心*

水上雅晴

一 問題的提出

日本早在大化年間(645—650)就開始使用年號,這當然出於模仿中國的紀年方式。其後,從大寶(701—704)改元到現在的1300多年間,一直使用著年號來紀年。日本的年號大多是由兩個漢字而構成的,年號文字基本上都有漢籍出典。大致說來,所有年號通過被稱為“改元定”的朝議而決定,參與“改元定”的大官和文人各自提出“年號勘文”,其中寫有新年號的候選案以及漢籍出典,在很多場合同時附載出典的原文,換言之,古代年號勘文中保存有當時國內流通的漢籍文本。一些研究者已經對這種包含年號勘文的年號資料加以調查、探討,從而梳理、闡明“改元定”的內容和程序、實際年號和候選年號的實際出典^①,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看到從校勘學的角度進行的研究。本文有鑒於此,關注日本年號資料所引漢籍的文本,對此加以考察,從而衡定其在經書校勘上的價值,順便談到古代日本漢

* 本文為2014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B)“中日校勘學發展與相關複合性研究”(項目批准號:2332000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① 相關研究有: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初版,東京:目黑書店,1933年;復刻版,東京:講談社,1983年;所功《年號の歴史—元號制度の史的研究—・増補版》,東京:雄山閣出版,1988年,頁86—87;佐藤均《革命、革令勘文と改元の研究》,神奈川:佐藤均著作集刊行會,1991年等。

學水平。

二 日本年號資料所引漢籍的來源

(一)年號資料和文章博士家

日本到明治時代(1868—1912)效仿中國明代以後的制度設立“一世一元”之制,根據森本角藏(1883—1953)之說,到此之前以“代始”、“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祥瑞記念”、“災禍厭勝”等為理由屢次召開“改元定”,從大化元年(645)到大正十四年(1925)的1281年間,一共有229個年號,每一個年號的平均使用時間為五年半^①。從此可以推知,參與“改元定”的人員和他們所引漢籍資料很多,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漢籍資料大多是來自特定氏族。

再據森本角藏說,“年號勘文奏進者”一共有222名,其中菅原氏占據109名,藤原氏93名,大江氏10名,其他氏族分別只占一、二名。簡而言之,從正曆(990—995)到建久(1190—1199)的二百年間可稱“藤原氏優勢時代”,藤原氏居多,大江氏和菅原氏次之;從正治(1199—1201)到文明(1469—1487)的三百年間可稱“菅原氏、藤原氏平行時代”;從長享(1487—1489)到江戶末年(1867)的四百年間可稱“菅原氏獨占時代”^②。藤原氏、菅原氏以及大江氏都可稱文章博士家,他們三氏世襲獨占文章博士的地位,在“大學寮”即國立大學內講授漢籍,特別是文學和史學方面的漢籍。如此看來,在“改元定”文件所引漢籍源自文章博士家內所傳的,以寬治(1087—1094)改元為例而言,提出年號勘文的是大江匡房(1041—1111)、藤原成季(1062年因病致仕)和藤原敦宗(1042—1111)等3人,其中成季和敦宗的官銜就是“文章博士”^③。

日本年號資料中所引漢籍的文本是在有限範圍內傳承的,可以認為是文章博士家系統的文本。除了文章博士以外,大學寮還有“明經博士”專門

① 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第1編第2章《改元の理由》;第2編第5章第2節《年號の繼續年數の長短とその時代》。

② 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頁59—60,頁126。

③ 所功《年號の歴史—一元號制度の史的研究—・増補版》,頁86—87。

講授儒家經典，其地位同樣逐漸由特定氏族即中原氏和清原氏所世襲獨占。其中，清原氏的有關經學資料，留存數量特別多，給我們提供有關經傳文字校勘的豐富材料。日本到近世以前經學鈔本，大多著錄於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我們從這本目錄中附寫的注記可以看到不少經書鈔本果然是來自清原氏的，而不能看到直接來自文章博士家的經書鈔本^①。這意味著，如果僅以經書鈔本為對象進行調查，則難以目睹文章博士家系統的經書文本以及訓點，從這個觀點來看，日本年號資料是值得寶貴的。

(二) 高辻長成《元秘別錄》

現存日本年號資料的概要，通過森本角藏所編的目錄可以把握，他將這種資料分為三類：第一類包含“改元定”的公式記錄、與會人員的記錄、從公卿日記中摘錄有關年號記載而匯集的資料集等；第二類包含年號事宜的日記本身；第三類則包含有關年號的議論和研究^②。在這三類之中，第一類占據絕對多數，收錄文章博士家所傳經書文本的資料也包含於此類。

本文針對高辻長成(1205—1281)編纂的年號勘文資料集進行探討。高辻是構成菅原氏的一家，屬於文章博士家，所以高辻長成又稱為菅原長成。就年號資料而言，他撰寫了《元秘抄》和《元秘別錄》二書，根據所功的說明，《元秘抄》“收錄有與從‘大寶(701—704)’到‘弘安(1278—1288)’的年號有關係的各種資料(追記到‘永祿(1558—1570)’)”，而《元秘別錄》則“分類匯集年號勘文。”^③就內容而言，《元秘抄》收載日本和中國的年號文字、兩國年號所用字的比對考察、年號勘文的樣本、年號的典據文獻，還有

① 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阿部隆一遺稿集》第1卷・宋元版篇，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頁211—226。根據該目錄，只有一本《毛詩》鈔本全面寫入清原宣賢訓點，部分旁寫大江氏的訓點，見頁215。

② 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頁757—844。

③ 所功《年號の歴史—元號制度の史的研究—・増補版》，頁150。根據《元秘別錄》(內閣文庫所藏，索書號：146—123)，高辻長成自己參與建長(1249)、正元(1259)、弘長(1261)、文永(1264)、建治(1275)以及弘安(1278)的“改元定”，見第3冊第37葉右、第43葉左、第46葉左、第47葉左、第50葉左、第52葉左。

包含在“改元定”審議上實際提出的批評事例等有關“改元定”的先例^①。顧名思義,《元秘別錄》是《元秘抄》的附錄資料集,根據石井行雄的調查,《元秘別錄》分爲兩種:一種是以年號勘文爲主的資料集,可以稱爲“《元秘別錄(勘文)》”;另一種是以“改元定”參與人的銜名以及議程和審議記錄爲主的資料集,可以稱爲“《元秘別錄(交名)》”^②。在這兩種之內,後一種沒有收載年號勘文,就是說,沒有寫入漢籍文字,則與本文的研究目的沒有關係,所以本文利用屬於前一種“《元秘別錄(勘文)》”進行討論。菅原氏代代參與“改元定”,所以對他們來說,在每次“改元定”會議上提出的年號勘文是容易目睹而記錄的,高辻長成是將家內積累的年號勘文以及公卿的日記類匯集整理,從而編成《元秘別錄》的。

如上面所說的,候選年號往往伴隨著漢籍典故的原文,舉例講,在正曆(990—995)改元的時候,菅原輔正(925—1010)提出天保、皆安、平康、能成、和平等5個候選年號,在“天保”下有說明出處的“《毛詩》云云”41字,而“皆安”以下也一樣(01_9a—10a^③)。附帶說,他曾在天祿元年(970)任文章博士^④。《元秘別錄》所錄這種漢籍文字原來是從各份改元勘文中轉錄的,換言之,這些文字可能是來自于舉行各次“改元定”之時流通的漢籍中所有的,也很可能保留宋刊本出現之前的文章博士家所傳文本,具有相當的經書校刊價值。爲了判定其價值,我們對《元秘別錄》所錄漢籍文字加以探討。高辻長成親寫的《元秘別錄》現在失傳,因此本文以內閣文庫所藏《元秘別錄》六冊(索書號:146—124)爲底本進行探討。

① 高辻長成《元秘抄》一冊(內閣文庫所藏,索書號:146—118)。

② 石井行雄《室町時代漢籍訓讀の一事例—〈元秘別錄〉と云う窗から》,《語學文學》第46號,北海道教育大學語學文學會,2008年,頁12。

③ 本文在引用古籍鈔本的時候,以略號來代表。“01_9a—10a”是指“第1冊從第9葉右到第10葉右”。下同。

④ 黑板勝美編《公卿補任》第1冊,正曆三年條,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年,頁238。

三 《元秘別錄》所錄漢籍文本的古老性以及可靠性

根據森本角藏的調查，年號資料所引漢籍的種類達到 106 種，引用次數最多的是《尚書》120 次，其次是《周易》97 次，再其次是《文選》87 次，而《後漢書》、《漢書》、《毛詩》、《唐書》、《藝文類聚》、《禮記》等次之^①。《元秘別錄》中所引漢籍以經史類為主，其文字有時與通行本呈現差異，下面舉例說明。

事例(a) 在天喜(1053—1058)改元之時，平定親(995—1063)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永長”下引用《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說：“稟國永長，為後代法”(01_29a)。通行本《後漢書》作“享國永長，為後世法”(01_01b_65^②)，則《元秘別錄》將“稟”作“享”當為形近之譌，而“代”字很可能出於避唐太宗諱世民的改字。

事例(b) 在康平(1058—1065)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藤原實範(生卒年未詳)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康平”下引用《後漢書·梁統列傳》說：“文帝寬惠柔克，遭代康平”(01_31b，圖 1)。通行本《後漢書》將“代”作“世”(05_34_1166)，則《元秘別錄》所引《後漢書》的“代”字也無疑出於避唐太宗諱的改字。

事例(c) 在永保(1081—1084)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藤原有綱(?—1082)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政平”下引用《後漢書·左雄傳》說：“人所以安而失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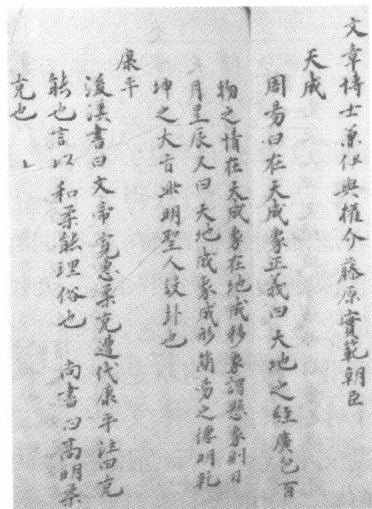


圖 1

① 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第 2 編第 2 章第 3 節《年號引文典籍の概説》。

② 范曄《後漢書》第 1 冊，卷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版，頁 65。本文在引用古籍影印本和排印本的時候，同樣以略號來代表。下同。

政平也”(01_42b—43a)。通行本《後漢書》作“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07_61_2016)，《元秘別錄》所引《後漢書》的“人”字也一定會出於避唐太宗諱的改字，而“失”字可能是來自“無”的異體字“無”之誤字。

從三個例子可以推測，年號勘文中所引《後漢書》來自唐代鈔本，而文章博士藤原成季在嘉保(1094—1096)改元之時引用的《後漢書·陸康傳》作“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紀”，與通行本一樣沒有回避玄宗諱“隆基”(01_49b/04_31_1113)，則文章博士家內傳承的《後漢書》文本可能保留中唐以前鈔本的舊貌。至於他們所傳經學文獻的文本則如何？

事例(d) 在天曆(947—957)改元之時，曾任文章博士大江朝綱(886—958)提出的勘文中包含兩個候選年號^①，他在“天受”下說：

《孟子》曰：“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敢問天民受，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在位五十年，百廿一歲’”。(01_5b)

這段文章來自《孟子·萬章上》，而引文包含兩個問題。一，引文不分經注，“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一句不是經文而是趙岐注文，抄寫這本《元秘別錄》者認識到這個事實，在行間寫入“此‘舜’已下九字，注也”的註記。二，引文包含深刻誤脫，例如“敢問，天民受如何”一句，原典作“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08_168_ub^②)。再者，引文末尾的“在位五十年，百廿一歲”一句不是在《孟子》中看到的，所以抄寫者又在行間附注說：“此已下小字，《孟子》本文并注無之”。註記中的“小字”暗示，該句原來是用小字在勘文中或者先行《元秘別錄》中附寫的，在繼續複寫的過程中混入引文正文內。值得說明的是，引文末尾一句有一定的根據，《敦煌變文·舜子變》引用《歷帝

① 大江朝綱在承平四年(934)“兼文章博士”，見黑板勝美編《公卿補任》第1冊，天曆七年條，頁194。

② 本文所引經注疏以及《校勘記》文字，以阮刻《十三經注疏》全八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版為底本，括號內的文字表示冊數和頁數以及上下面和左右之別。“08_168—ub”是指第八冊，頁168，上面。下同。

紀》孔安國注，說：“舜在位五十年，年一百十二歲，崩，葬蒼梧野九疑山”^①。

事例(e) 在康平改元之時，平定親提出的勘文中包含兩個候選年號，他在“永長”下說：

《禮記正義》曰：“聖人之道爲世被則，故庶幾夙夜以永長”。(01_30b—31a)

《禮記·中庸·疏》作“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05_899_2a)。年號勘文中的引文，與其是節略，毋寧說是妄改，特別是“庶幾夙夜以永終”七字出於《毛詩·周頌·振鷺》，不僅誤脫“譽”一字，而且將“終”字寫錯爲“長”，從而作爲年號案“永長”的典據了。《振鷺》的同一詩句原來見於《禮記·中庸》經文，如果平定親親自參閱，就一定不會發生這種錯誤。既然如此，則可以推測他只看《禮記》單疏本，沒有看到包含經文的《禮記》。雖然紹熙三年(1192)黃唐跋《禮記》注疏合刻本當時還沒出現，這在文獻處理上確有問題。

事例(f) 在治曆(1065—1069)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藤原正家(1026—1111)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寬祐”下說：

《禮記》曰：“寬祐者，仁之作也。溫良者，仁之本也。禮節者，仁之兒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呂氏春秋》曰：“夾鐘之月，寬祐和平，行德去刑，行仁德，知刑義”。(01_34b)

前一段引文來自《禮記·儒行》，原典作“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05_979_1b)。後一段引文來自《呂氏春秋·音律》“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以及注文“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②。容易看到的是，《元秘別錄》中的引文不僅刪節原文，而且改變文字和句序。最有問題的是，兩種出典原文均作“寬裕”而不作“寬祐”，就是說，兩書原來不可以當作“寬祐”年號的典據。

①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956。

②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頁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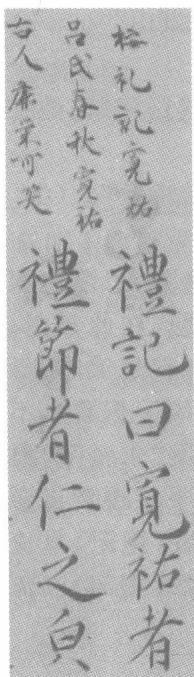


圖 2

但是藤原正家又在承保(1074—1084)改元之時依舊以《禮記》為典據來提出候選年號“寬祐”(01_39b),直到藤原宗業(1151—?)在建仁(1201—1204)改元之時仍然以《禮記》和《呂氏春秋》為典據來提出候選年號“寬祐”(01_51b)。這種錯寫顯然不是出於抄寫《元秘別錄》者的錯誤,而是出於文章博士家內所傳經傳文本原有的錯誤,因此抄寫《元秘別錄》者在治曆改元部分的欄上附注寫著:“按《禮記》‘寬祐’、《呂氏春秋》‘寬祐’,古人庸采可笑”(01_34b,圖2)。

事例(g) 在康平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菅原定義(1012—1065)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康德”下說:

《尚書》曰:“王人無弗康德,明恤小臣,屏侯甸”。注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久,以為蕃屏侯甸之服”。(01_32a)

《尚書·君奭》經文作“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注文作“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01_246_ub),則《元秘別錄》所錄經文中“無弗”是出於“罔不”二字的改動,而“康”、“甸”、“久”分別是“秉”、“甸”、“人”的誤字。從此可知,《尚書·君奭》“王人”云云一段經文,原來也無以當作年號案“康德”的典據,文章博士家內傳承的文本可謂包含不少問題。實際上,《元秘別錄》在引用《尚書》經傳之後,用小字標注“寫本云”介紹兩種經文,說:

《尚書》兩本雖引見,未決,但寫本也。以摺本可決歟?

一本:“王人無弗康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一本:“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下段附記)已上為“秉”字者,康德之義相違歟? 上古尚兩說乎? 如何? (01_29b①)

① 這些文章是從內閣文庫所藏別本《元秘別錄》七冊(索書號:146_23)引用的。就底本而言,這個地方的文字發生混亂令人感到奇怪,在此不引。

這或許是高辻長成的附記，他發現家內傳承兩種鈔本《尚書》，其中一本作“秉德”，不可以作為年號案“康德”的典據。不過，他自己不能決定以哪一本為準，所以希望參閱“摺本”即中國刊本《尚書》而作出斷定。明經博士家清原宣賢（1475—1550）鈔本《尚書》卷七跋文收錄家內先儒清原近業（1152—1183）的識語“嘉應三年（1171）三月十五日校摺本了”^①，則到長成之前，刊本《尚書》已經傳入日本，但是他沒有得到機會參閱。

從四個例子可以了解，《元秘別錄》所錄漢籍文本不能說具有充分的可靠性。由於文章博士家對漢學的造詣並不算高，因而他們不能校正鈔本中的誤字，未免將包含誤字的文本繼續傳承。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就簡單認為《元秘別錄》所錄漢籍文本完全沒有校勘價值。事例(g)中的“以摺本可決歟？”一句，從另外角度來看，又表明文章博士家內所傳的《尚書》文本沒有受到刊本的影響，保留了若干刊本以前之舊貌。

四 《元秘別錄》所錄漢籍文本的校勘價值

《元秘別錄》所錄漢籍的文字與通行本有所不同，一些相異文字見於阮元《校勘記》（以下“阮校”）所引異文中，則不都是出於誤寫，舉例說明一下。

事例(h) 在正曆（990—995）改元之時，曾任文章博士的菅原輔正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五個候選年號^②，他在“皆安”下說：

《尚書·注》曰：“官職有序，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爲至治也”。

（01_9b）

通行本《尚書·周官·注》在“衆政”上有“故”字，而“所爲至治也”一句作“所以爲正治”（01_269_1b）。阮校就後者說：“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01_283_2a），則《元秘別錄》所錄《尚書》文本與“古本”等相近，不能認為是

① 小林芳規《平安鎌倉時代における漢籍訓讀の國語史的研究》附錄《漢籍古點本奧書識語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頁1435。

② 菅原輔正在天祿元年（970）任文章博士，見黑板勝美編《公卿補任》第一冊，頁238。

誤字。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序》在“古本”下附注“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01_25_b1),則他所謂“古本”是指山井鼎(1690—1728)撰、物(荻生)觀(1673—1754)補遺《七經孟子考文》所引文本,而山井在《七經孟子考文·凡例》中說:“有曰‘古本’者亦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又說:“皆此方古博士家所傳也。所以識者,其《禮記》書尾猶存永和(1375—1379)年中清原良賢句讀、舊跋”^①。從此可知“古本”文本來自“古博士家”即明經博士家清原氏的鈔本,而就《尚書》來說,清原氏鈔本的文本可以回溯到《隸古定尚書》^②,文章博士家的文本與此有所呼應。

事例(i) 在永保(1081—1084)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藤原行家(1029—1106)提出的勘文中包含三個候選年號,他在“永保”下說:

《尚書》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人(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安民也)”。(01_43a)

通行本《尚書·梓材》經文作“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注文作“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01_213_ub),則正如森本角藏所推測,“民人”二字是出於避諱改字而發生的錯誤^③。阮校就注文說:“古本‘居’作‘君’,監本亦作‘君’,與疏不合”(01_217_lb)。《元秘別錄》所錄《尚書》文本又與“古本”相近,雖然文意與疏義相戾。

事例(j) 在嘉保(1094—1096)改元之時,文章博士藤原成季(生卒年未詳)提出的勘文中包含兩個候選年號,他在“弘德”下說:

《周易正義》曰:“得位處尊,爲天下之主,兼弘德義”。(01_49b)

通行本《周易·益卦九五爻辭·正義》作“得位處尊,爲益之主,兼張德義”(01_97_la),則“天下”二字是“益”字之譌。阮校就“兼張德義”句說:“錢本、

① 山井鼎撰;荻生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叢書集成新編》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頁3。

② 清原氏《尚書》鈔本的文本性質,參看水上雅晴《日本中世時代〈尚書〉學——以清原家的經學爲考察中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4期,2013年。

③ 森本角藏《日本年號大觀》,頁91。